

## 十字路口

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孩子在十字路口等綠燈過馬路，我就站在她對面的路口看着她，覺得很有趣。

青春期的少女有種奇特的心理，一離開家門，她就會覺得街上每一個人都在注視她。因此，為了保護自己，為了表示自己毫不在意，她總是會把面龐稍稍抬起，做出一副目不斜視、無邪而又嚴肅的樣子，尤其在少女孤單一人處在人群之中的時候更是如此。看着她那樣辛苦費力地慢慢走過馬路，我不禁微笑了起來。天知道，整個十字路口的人群裡，除了我還有誰在注意她呢？在這些為了生活匆忙奔波的人里，誰有時間站住了去端詳一個青澀的小女孩呢？

一個胖胖的中年婦人匆忙地越過了她。婦人的年齡也許剛過四十，也許只有三十五六歲，但是她的穿着和面容已經到了可以說毫無修飾，甚至毫不掩飾她的困頓與忙迫的地步，她是真正地被生活蹂躪到對任何事、任何人都絲毫不在意的程度了。

婦人與少女都越走越遠了，我仍然站在原地，想着時光怎樣改變人的心和人的面貌。想着二十年的歲月可以造成這樣劇烈的改變、這樣遙遠的差異，不禁悵然。



## 留在餐館的東西

兒子帶著老父親去一家餐館吃晚餐。

父親年邁體弱，吃飯時不小心把食物撒在襯衫和褲子上。別的食客厭惡地看着他，他兒子卻平靜如初，毫不覺得尷尬。父親吃完飯，兒子默默地把老父親帶到洗手間，為他除去飯粒，擦掉污漬，給他梳理頭髮，戴好眼鏡。

他們出來時，整個餐廳的人都靜靜地看着他們。兒子結清賬單，帶着父親一起往外走。

就在此刻，餐館里的一位老人叫住那個兒子，問他：“你沒覺得自己留下什麼東西嗎？”

兒子回答：“沒有，先生，我沒有。”

可老人對他說：“有，你留下了！你給每個兒子留下了榜樣，給每個父親留下了希望。”

20歲出頭的張愛玲肯定特別羨慕空巢青年。

1941年12月8日，太平洋戰爭爆發，香港被日軍圍困，中斷學業的張愛玲回到上海。父親的家，她是回不去了，於是只好和姑姑一起，住到愛林登公寓的6樓65室。

張愛玲和姑姑一起住，一切都是AA制。

寫信的時候，一面寫，一面喝茶，信上滴了一滴茶，墨水洇開來成為一個大圓點。姑姑看見了，就笑話她，說要是被媽媽看見了，“還當是一滴眼淚”。張愛玲想要再抄一遍，姑姑“知道是她一句玩話說壞了，也有三分不快，粗聲道：‘行了，不用抄了’”。

最終還是沒有抄，張愛玲說：“為三姑現在這樣省，不好意思躡躅一張精緻的布紋箋，方纔罷了。”

有一次，她着急到陽臺上收衣服，膝蓋磕到玻璃門上，流了血，直濺到腳面上，塗上紅藥水，更是渲染得可怕。她給姑姑看，姑姑彎下腰，匆匆一瞥，知道不致命，就關切地問起玻璃，張愛玲趕緊去配了一塊。

單身的時候還好，等到和胡蘭成談戀愛，則更加窘。兩個人在房間坐着，胡蘭成習慣性關門，兩人聊天忘了時間，張愛玲心里便想，姑姑肯定要生氣。

後來關係公開了，留胡蘭成在家里吃飯，添菜“不過是到附近老大房買點醬肉與‘鋪蓋捲’——百葉包碎肉”，都不是胡蘭成愛吃的，但張愛玲說，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，原因很簡單：她是跟着三姑過，雖然出一半錢，但要留神不能喧賓奪主，只能隨隨便便的，還照本來的生活方式。

到了後來，她真的成了空巢人士，只不過，那時候已經不是青年了。

但祖師奶奶給了我們一套規範的空巢青年自救指南。

首先，要有自己的娛樂愛好。

張愛玲確實很適合空巢生活。她很喜歡睡覺，“沒事總躺着”；她也喜歡看電視，關心辛普森案，說“那是社會上的電視連續劇，是偵探故事，很有趣”。

其次，要學會斷捨離。張愛玲對待自己的私人物件，是很能斷捨離的。林式同後來幫張



## 餐桌永遠閑置

再一次看英劇《唐頓莊園》，依舊被那整齊齊“共進晚餐”的場景所震撼。大管家拿着尺子，來測量鄰座杯子與盤子之間的距離，以保證每位就餐的家庭成員之間相隔20英寸（約0.51米——編者注）。女士上桌前要戴上形態各異的帽子，男士要打領結。即使餐桌足夠長，看上去仍很擁擠。20英寸是一個很短的距離，端坐的人如果不干擾鄰座，就需要如老祖母教導的那樣——夾緊自己

的腋時，再微微放鬆。這恐怕也能解釋，為何英國人的幽默，都是那種“夾緊腋肘”式的。

這種長餐桌，在如今的英國家庭已被閑置。一來，就算是鄉紳，也已經雇不起那么多管家和僕人；二來，年輕人都去了大城市，只剩下老爺、夫人坐于長餐桌的兩端。這餐桌望過去一片荒涼，還不如乾脆在起居室小巧的早餐桌上吃正餐，至少那里有陽光、報紙，兩個人也能坐得近一些。

在中國，餐桌被閑置是從電視普及開始的。那時候，大部分三代同堂的家庭都有一張八仙餐桌，祖父母外加兩個孩子的小家庭坐下來，正好坐滿一桌。電視機進入家門，八仙桌上的“缺口”就越來越多。老爺一開始為此火冒三丈，呵斥夾了菜去看電視的兒孫“沒有規矩”“吃個飯也不安生”。

又過了一陣子，《射雕英雄傳》來了，《霍元

甲》來了，老爺子也覺得花生米就酒，不如電視劇就酒更有滋味，就特許老伴兒將菜盤挪到電視機前的茶几上，自己也早早端坐在沙發上，準備好溫熱的黃酒。餐桌從此宣告“下崗”，只有吃年夜飯時，它才能履行職責。

網絡時代來臨，茶几和沙發也不再擔當餐桌、餐椅的重任。隨便走進哪個老人的家，都會看到茶几上堆滿了小藥瓶和保健品，還有養生報刊與養胃零食，唯獨不見那些砂鍋墊、菜盤墊了。老爺子說，年輕人都加班，經常吃過外賣才回來。而他們年紀大了，胃口漸小，炒菜的分量也少，擋在大客廳里很快就涼了，不如就在廚房里搭個小桌子來吃。

我見過一位研究建築設計的教授，退休後的第一件作品，就是重新設計自家的廚房。他在廚房一角安裝了早餐桌，在觸手可及的地方放了自己最愛讀的書和開了瓶的酒。這樣，老伴兒炒菜，他可以陪着說話；新做的砂鍋或小炒轉身就能上桌，在冬天可保熱氣不散。老先生向我炫耀說，現在每次兒孫歸來團聚，也不會各自倒在客廳沙發或臥室里玩手機，而是擠在廚房，等着老伴兒把做好的櫻桃肉夾到他們嘴里。他們與成日操勞的老太太斗嘴調侃，同看視頻，甚至還在老太太的指導下，耐着性子拍碎一頭蒜。

“您怎麼有這等本事？”我好奇地問。老先生得意地笑了：“你把路由器裝在臥室怎麼行？我就把它裝在廚房的一角啊。”

人的坦誠相待並不是一件危險和可怕的事。任何人不必對他人虛幻的期望負責，能讓大家都喜歡你是幸運的，能讓大家都討厭你是不幸的，但是按照別人的期望呼吸、吃飯、說話，打哈欠是不必要的。一個人只能生活在自己的音容笑貌之中，即使它充滿了缺陷。我的天性總是使我在那些失望的眼神中露出尷尬的微笑，但我想告訴一些勇敢的朋友，當有人對你說“我對你很失望”時，你可以這樣回答他：“我對你的失望很失望。”

這次我突然生氣了。我不再有那種脆弱的、對不起大家的感覺了。我突然意識到，在這些失望的人面前，我是無辜的，我不該對他們的失望負責。我想他們的失望在於某種期望，可是為什麼要對一個未曾謀面的人有所期望呢？假如我是一棵梨樹，別人把我看成一棵桃樹，我不能因此責備我自己。假如別人喜歡的是桃樹，而我作爲梨樹，那就只能用外交辭令對那些失望的人說：“非常抱歉，你看錯了，我不是桃樹，而是一棵梨樹。”

我不知道我的這種經歷是否涉及一種人際關係，但我想，人與

林式同幫張愛玲租房子，給張愛玲找醫生看皮膚病，也給張愛玲做司機（儘管張愛玲很少麻煩他）。1994年地震，林式同第一時間給張愛玲打電話，為的是確認她的安全。張愛玲沒接電話，不過給林氏夫婦寄了一張明信片，表達自己的謝意。

林式同對張愛玲不接電話的行為不以為意。他體諒她，並且說，她打來電話的時候，他保證都在。

這對空巢青年來說，實在太重要了。

1995年9月8日中午，12點30分，林式同剛剛打開一份報紙，忽然，電話響了。



## 對失望很失望

愛玲》中所說：

她要馬上火葬，不要人看到遺體。自她去世火化，除了房東、警察、我和殯儀館的執行人員外，沒有任何人看過她的遺容，也沒有照過相，這點要求我認為已經做到了。

從去世到火葬，除按規定手續需要時間外，沒有任何耽誤。

她不要葬禮。我們就依她的意思，不管是在火化時還是海葬時，都沒有舉行公開的儀式。

她要把她的骨灰撒向空曠無人之處。這遺願我們也為她做到了。

最後她要我把她的遺物，包括銀行的存款，全部寄給宋淇夫婦。這差事我也由律師協助，順利完成。

她在遺書上寫的幾點，我都替她辦到了，她如在天有靈，想來也會點頭稱許了。

幸好，在這個方便快捷的時代，作為空巢青年的我們，已經比張愛玲幸運得太多太多。

這城市里，也總有許許多多的陌生人，為晚歸的我們，為獨居的我們，為打拼的我們，提供許多溫暖。

感謝那個常常來給我送外賣的小哥哥：雖然在淒風苦雨中，有時候他也會遲到幾分鐘，但總是會提前打電話來說明情況，向我道歉；送來的外賣永遠是冒着熱氣的，即使外面大雨滂沱，帽子上的水滴在地上，外賣盒子卻被他保護得好好的；跟着外賣一起遞過來的，還有那句“希望你用餐愉快”。嗯，會愉快而認真地好好吃的。

感謝便利店那位坐着織毛衣的阿姨：在加班的夜晚，看見我進來，逕直跑到顧東煮的鍋前，等我報數，麻利地盛好，總會給我加一勺湯：“多喝點湯好，這湯沒味精。”柴魚高湯的味道是淡淡的，里面也不過是蘿蔔、鷄蛋、魚竹輪之類的尋常食物，但一口喝下去，一日的辛勞，被老闆呵斥的委屈，與同事之間的鷄毛蒜皮，就統統煙消雲散。

感謝越來越多注意到空巢青年需求的品牌，設計出適合一人使用的產品：一個人喝的湯，一個人用的烤箱，一個人用的麵包機，一個人用的咖啡壺……

## 獨居指南



8.附近要有公交車——交通一定要方便。

9.不怕吵(有噪音、車聲、飛機聲最好)。

最後一條“不怕吵”，那恐怕是張愛玲知道，作為空巢青年，最難抵抗的是寂寞。

最後，祖師奶奶說，你要選一個靠譜的遺產執行人。

張愛玲選的是林式同。

林式同並不是張愛玲的粉絲，他甚至沒有讀過張愛玲的文章，更確切地說，他甚至不是一個文學青年。

然而，他卻是由張愛玲的真愛粉莊信正推薦而來的。他對和張愛玲的關係，拿捏得特別準。

那就是：需要我的時候我就來，不需要我的時候絕不打擾。

打電話來的是一個伊朗姑娘，她慌慌張張地說：“你是我知道的唯一認識張愛玲的人，所以我打電話給你，我想張愛玲已經去世了！”

打電話的是張愛玲的房東，這個公寓是林式同幫張愛玲租的。

他成了見過張愛玲最後一面的唯一一個中國人。

張愛玲是躺在房里唯一的一張靠牆的行軍床上去世的，身下墊着一床藍灰色的毯子，沒有蓋任何東西，頭朝着房門，臉向外，眼和嘴都閉着，頭髮很短，手和腿都很自然地平放着。她的遺容很安詳，只是出奇的瘦，用來保暖的日光燈在房東發現時還亮着。

在林式同的安排下，張愛玲終於得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告別人世。就像林式同在《有緣得識張